

宽窄巷

宽窄切角展·都市慢生活

博图志

封面

2019.10.16 星期三

主编 杨莉 责任编辑 仲伟 版式 吕燕 校对 廖焱伟



更多凉山宝藏，扫码上封面新闻。



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



汉代洗脸盆 高档人士用鱼纹铜洗

初见鱼纹铜洗，大家都会惊呼：“这不就是一个洗脸盆吗？”“对啊，它就是一个洗脸盆，但却不是普通的洗脸盆，差不多算是洗脸盆的‘老祖宗’了，并不是人人都可拥有。”凉山州博物馆工作人员贾丽笑着说。

“以铜作镜，可以正衣冠。”在铜镜产生以前的岁月里，古人常在一种叫做“铜鉴”的盒子里盛上水用来照影，因而后世也把铜镜称为“铜鉴”。铜鉴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，发展到汉代时改名为“铜洗”，并有了新的用途。顾名思义，“洗”就是盛水用作盥洗的器具，从功能和外形上来看，和我们现在普遍使用的洗脸盆差不多。

现代社会，不管有钱没钱，洗脸用的都是质地差不多的脸盆，可在汉代，不同等级的人，洗脸所使用的用具其材质却大不一样。

铜洗最早出现于战国晚期，在汉代最为流行。因为在汉代，铜器仍然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，所以铜洗只能是汉代上流社会的人才才有资格使用，普通老百姓一般只用得起木洗、陶洗。

铜洗一般为圆形、敞口、鼓腹、平底，腹部外壁有对称的铺首衔环一对，便于使用时提携。铜洗的内底部大多铸有花纹图案，花纹大多为鱼纹、鱼鸟纹或羊纹，有着富贵有余、洁白如鹭、吉祥如意的寓意。有的铜洗中央还铸有铭文，铭文的内容有吉祥语、铸造的年代等，其中铭文内容为产地的较为少见，因此也弥足珍贵。



杨家山一号墓出土的鱼纹铜洗。



双鱼纹铜洗局部。

二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在西昌马道的杨家山一号墓中曾经出土过三件铜洗，三者竟呈现出彼此不同的式样。

其中一件为“鱼纹铜洗”，该铜洗为敞口、方唇、宽沿，弧腹较浅，浅圈足。口径32、圈足径巧6、高5.6厘米。腹部有对称的铺首，底部有等距离的三枚乳丁，内底饰阳线鱼纹。在全国范围内出土的铜洗中，双鱼纹铜洗居多，而杨家山一号墓出土的这件“鱼纹铜洗”却为“单鱼纹”，且无铭文标注，让它充满了神秘色彩。

另一件为“凤鸟纹铜洗”，该铜洗为敞口、方唇、宽沿略斜，深弧腹，平底。口径34、腹径31.2、底径16.6、高17厘米。腹上部和中部分各饰两周凸弦纹，腹部有对称的铺首，内底饰有浅阳线凤鸟图。

第三件则为敞口、方唇、斜宽沿，折腹较浅，平底，腹部有对称的两个圆形鼻钮。口径23.9、底径10.6、高5厘米。

就目前发现的铜洗资料来看，无论是出自墓葬、窖穴或是传世品，形制大小多较接近，实物资料反映，这类铜洗是实用器而非明器（注：明器即随葬品），原本应该是活人使用的一类生活器物。

杨家山一号墓为东汉时期砖室墓，不仅出土了摇钱树、五枚钱叠铸等稀罕物件，还发现了洗、壶、釜、甑、釜、釜、耳杯等生活用具94件，其中以铜器数量最多，多达57件，陶器次之，还有少量铁器、金饰和铜钱。

而实用铜洗就有三件，可见墓主人非常尊贵，家世显赫，生前过着十分讲究的生活，否则，也用不起如此之多代表身份和地位的铜制物品。

三

无独有偶。早在1992年8月，西昌市东部，邛海北岸凉山电视台基建工地挖出一组汉代青铜器，经西昌市文管所现场勘察和清理，确认这是一处汉代窖穴，附近汉晋砖室墓密集，其东2公里多外有一大型汉代聚落遗址——大坟堆汉代遗址。窖穴距地表深1米许，窖穴外形已被民工挖坏，穴中集中埋有东汉青铜器三件，其中一件为“永和元年铭文双鱼洗”。

该铜洗为侈口，宽沿，深腹，平底，腹外腰部饰四道凸弦纹，有对称铺首两个。洗内底部阳铸“永和元年李造作工”八字铭文。铭文有边框，字体篆书，竖行。铭文两侧对称各阳铸一鱼纹，两鱼大小一样，左鱼体态瘦削，右鱼肥大，似有雌雄之分。双鱼头皆朝上，尾展开，身披鳞，张口吐气，两翼有水波，作游动状。该洗口径36、口沿宽3.3、底径19.5、通高19.5厘米，比杨家山一号墓出土的最大一个铜洗还要大。其做工精良，光洁度好，纹饰优美，可称为汉代铜器中之珍品。

目前，我国已知的东汉铭文双鱼纹铜洗中，大都出自朱提县和堂狼县（今云南昭通、会泽一带）。朱提、堂狼洗的铭文有自己的显著特点，只铸纪年和产地，诸如：“建初元年堂狼造”“建初四年朱提作”“延平元年朱提造工”等，无一例铸有造作人姓氏的。但西昌东部出土的“永和元年李造作工”铭文双鱼洗却在纪年和造作人姓氏之后缀一“工”字，而没有产地，这在大渡河以南以及云贵高原的“西南夷”地区尚属首见。“永和元年”为东汉顺帝刘保的纪年，即公元136年，可见此铜洗的独特与珍贵。

朱提县地处川滇黔交界区，是汉武帝时所置，它北通巴蜀，南接滇越，东溯夜郎，西邻邛都，是巴蜀文化、夜郎文化、滇文化的交汇激荡之区。朱提多出产银、铜，《汉书·地理志》有载：“朱提，山出银”；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亦载：“朱提，山出银、铜”。可见在两汉时，朱提就是重要的银、铜产地，因其铜矿蕴藏丰富，为朱提青铜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资源上的保障。

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们对西昌历史的了解停留在距今两千年前，因为在有据可依的文献里，西昌模糊的样貌最早出现在汉代，那时它叫“邛都县”。它的诞生，始于大汉王朝对西南疆域的开拓，以及郡县制的推行。

西汉元鼎六年（公元前111年），汉武帝设置越嶲郡（今凉山），下辖十五个县，郡治邛都（今西昌）。此后不久，在司马相如的主持和带领下，“蜀身毒”道成功开通，这条远达印度的商贸之路给西昌带来了文化和经济的繁荣，也让西昌的文化进程发生了跳跃式的变化。

汉代以前，西昌的出土文物多以石器和陶器为主，少有青铜器的身影。而汉代以后，尤其是东汉末年，安宁河流域发现了丰富的汉代遗存，且在西昌及周边发掘的诸多汉墓中，铜器变得常见，其中不乏一些精品文物。

在汉代，铜器仍然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，为何它们在汉代以后开始集中出现？且西昌周边出土的铜器为何大多都是生活用具？如此多的铜器出土是否又与邛都产铜有所关联？

邛都制造 古代婚嫁专用奢侈品



双鱼纹铜洗内底部拓片。

四

南山出铜 两千年前的『邛都制造』

朱提青铜器中，确有年代可考的、最早的当数“建初元年朱提堂狼造”铜洗。“建初”为东汉章帝刘昶的年号，“建初元年”即公元76年；最晚的为罗振玉《贞松堂集古遗文》卷十四，容庚《汉金文录》卷五著录的双鹭花纹的“建宁四年堂狼造”洗。“建宁”为东汉灵帝刘宏年号，“建宁四年”即公元171年。朱提青铜器的代表器物铜洗，绝大部分产生于公元76年至公元171年的近百年时间内。

朱提西邻邛都，《汉书·地理志》有载：“邛都，南山出铜”。所谓南山，只是宽泛地概括了邛都以南的山脉，据考证，是指今天的螺髻山一带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文物普查中，果然在西昌南部山丘的贵联关、黄水等地发现大型汉代冶铜遗址多处，印证了史料记载。其中，贵联关镇东坪村汉代冶铜遗址面积就达18万平方米，暴露于地表的冶铜、铸铜、烧炭、铸币等炉基多达数十个。足见在汉代，邛都县的冶铜、铸铜业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。

“永和元年铭文双鱼洗”虽然产地不明，但其铭文的特征既有别于朱提、堂狼，纹饰又不具备“东汉蜀郡（铜洗）底部多饰凤、羊等图像”的风格，所以不排除“永和元年铭文双鱼洗”就是“邛都制造”的可能。加之，这件“永和元年铭文双鱼洗”的鱼纹造型、艺术手法等，又与云南昭通文管所收藏的“阳嘉二年邛都造”铭文双鱼洗基本相同，尤其是鱼鳞、鱼尾、水波等夸张技法、线条风格，几乎是出自同一工匠之手。由此可以推测，当时“邛都制造”已经颇具规模，所产青铜制品除供本地使用外，还销往了其他地区。

值得特别一提的是，在凉山州博物馆的库房里，还有一件保存完整的双鱼纹铜洗，其内底部铸有篆书的“永建二年邛都造”铭文，“永建”是东汉皇帝汉顺帝刘保的第一个年号，“永建二年”即公元127年。这就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，早在一千九百年前，西昌一带已经与朱提、堂狼一样，开始生产铜洗。

由于东汉时期的越嶲郡与朱提郡（东汉建安十九年，即公元214年改县为郡，下辖朱提、堂狼等五县）山水相连，两地之间的经济、文化交流非常频繁，朱提、堂狼的铭文双鱼洗闻名于世，而邛都也是重要的产地之一，其历史、艺术和科学价值都是显而易见的。

同时，古代的西昌由于独特的地理优势，一直是“南方丝绸之路”上的重镇，“南方丝绸之路”的开通，也推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、贸易、文化及手工业发展，“邛都铜洗”就是实实在在的明证。



西昌马道杨家山一号墓出土的铜镜戏双耳杯。

清代四川名人『绰号』拾趣①

朱丹

四川总督——李豆花

李豆花指的是曾任四川总督的贵州黔西人李世杰。因他常买“蜀中市肆未成熟的豆腐杂生菜煮”的“豆花”吃，赢得“李豆花”美称。

关于“豆花”，《雅安志》卷四称“浸豆腐浆，岩盐点之成乳，曰豆花。用粗布裹作方块，曰豆腐”。四川人俗称豆花，与北方的豆腐略有不同。“豆花即豆腐之未成者”，它介于豆腐脑与豆腐之间，嫩一点叫豆腐脑，老一点叫豆腐。所以有老豆腐、嫩豆腐之说。食物之嫩者，莫如豆花。日常生活中，形容女人皮肤白嫩也叫豆花。车福先生的小说《锦城旧事》里有个重要人物“嫩豆花儿”，其真名早已无人知晓，因为地皮肤白而且嫩，所以大家都叫她“嫩豆花儿”。

《嗜海成都笔记续编》称：“成都小吃嗑甲子各省最著名者，先有山西馆之豆花，只三文钱一碗。椒油麻酱，辛香异常，每日开堂不过五钟，即已告毕。”不知道酷爱吃豆花的李总督，当年是否曾去光顾过。如今成都的大街小巷，时常可以看到富顺豆花、李豆花的店铺，也是门庭若市、热闹非凡。

川剧宗师——康二蛮

康二蛮指的是被称为“康圣人”的一代川剧宗师康子林，因其乳名“二蛮”得名。

康子林于清同治九年（1870）生于邛崃，在家排行老二，长兄康子久，乳名“康大蛮”，他别名“二蛮”。《南史·萧子响传》说，“人名蛮，复何容得蕴藉？”但四川民间却不这样认为。尽管儿女金贵，却都要给他们取个低贱难听的乳名，认为这样孩子才会无灾无病顺利地成长，也就是俗话说的“叫得开，免了灾”，正如民国《南溪县志》所说“祝其体力强健如蛮族，故曰蛮也”。

1930年6月某日，重庆“鼎新”大舞台门前设了一个灵堂。在数百副对联中，有一副对联这样写着：“成都三庆会，中国两圣人”。还有一副对联的下联写着：“子林正音，有为变法，今后登台出角，谁继康家两圣人？”民国时期，中国有两个康圣人，一是维新变法的康有为，一是川剧舞台上的康子林。

《成都市志·川剧志》这样写道：康子林“一生极力维护三庆会，曾拒绝高薪邀请，甘与会内同人共渡危艰。对人谦和恭谨，从不疾言厉色，作风俭朴，律己甚严，复何容得蕴藉？”但四川民间却不这样认为。尽管儿女金贵，却都要给他们取个低贱难听的乳名，认为这样孩子才会无灾无病顺利地成长，也就是俗话说的“叫得开，免了灾”，正如民国《南溪县志》所说“祝其体力强健如蛮族，故曰蛮也”。

一个“戏子”何以博得“圣人”之名？不仅在于他戏演得好，更在于他的品德高。康子林是川剧文武生，文武、唱、做、高、昆、胡、弹无不擅长。功底深厚，嗓音清脆，吐字清晰，行腔委婉，韵味隽永，声情并茂。刻画人物细致真切，性格鲜明，形神毕肖，尖子、翎子、变脸等各种技艺俱佳。《评雪辨踪》里冷、密、酸、难的吕蒙正为他赢得“活蒙正”之誉，《情探》里志恩负义的状元郎王魁，《八阵图》里迷茫绝望的东吴都督陆逊，都是康子林的拿手角色。时人赞他“功盖三庆会，名成八阵图”。康子林为人正直，由他和杨素兰、萧凯成等人发起的川剧著名班社“三庆会”，被川剧研究专家周企旭先生视为“现代川剧”诞生的标志。民间戏班子，向来是海淫的渊藪，一些“草台班子”为吸引观众，尽演一些海淫戏，如《小上坟》《上游庵》等等。但票友们都知道，这些戏在三庆会里是看不到的。康子林告诫三庆会的演员要讲“口德、品德、戏德”，表演宁可不足，也不能过分渲染艳情，以免导人以邪。“康子林还成立研精社，致力于川剧改良工作。把昆、高、胡、弹、灯几类剧目综合在一起，对川剧的发展和艺人的团结起到了促进作用。

1930年6月，年届六旬的康子林因常年带病坚持演出，辛劳过度，殁于重庆。

来源：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